

译者的角色

I am invisible, understand, simply because people refuse to see me.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I translate, therefore I am not.

—Andrew Chesterman and Emma Wagner,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Bless thee, Bottom, thou art translated!

—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一、一则轶事/译事：米勒的期盼与忐忑

1991年10月，解构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台湾地区常译作米乐)应邀访问台湾并发表系列演讲，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是在中研院欧美所主办的第三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中发表的主题演讲《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在配合他首次访台所刊出的《跨越边界——〈中外文学〉米乐专号序》中，他提到了对即将来台访问的喜悦、期盼与不安：

我很高兴自己的一些作品现在会被人用中文来阅读；但这也使我不安。我既不懂中文，也从未访问过台湾……

但是，我现在自问：“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一个我不懂的语言，在一个我从未访问过的地方被阅读时，这些作品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如何能够发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是一种奇怪的剥夺的形式 (a strange form of dispossession)。我制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的自我感受、我自己的语言、与我自己国家特定的社会及建制机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些东西，以及来自我阅读自己传统中特定作品的一些东西——这些都被拿走，而且转变成其他的东西，变成我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一些东西。(米勒，1991: 4)

在主题演讲中，米勒根据有关语言的践行效应 (performative effects) 理论，主张来自一个语言、文化脉络的理论在被译入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时，有些成分得以保留，其他部分可能会转变，衍生新意。他以一些具体实例说明这些转变与衍生，赋予正面评价，并称之为“新开始” (new starts)。¹

对于米勒来说，如果来访前的专号之翻译与编辑是“事前品味” (foretaste)，那么来访后的专著之翻译与编辑则可说是“事后品味” (aftertaste)。吊诡的是，强调语言的不定与衍异、着重翻译践行与创新效应的米勒，在面对自己作品被翻译时的态度。《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一文的中、英文版经过反复修订、即将在台湾付梓之际，他在原先的结论部分增加了十几个字：

因此，理论的翻译是误译的误译，而不是对于某个权威的、明晰的原本的误译。这应该会使那些翻译理论并在新情境中以践行的方式使用理论的人高兴。“使之正确” (“getting

1 有关米勒的翻译理论较全面的探讨，可参阅张旭《跨越边界与话语反思——试论希理斯·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it right”) 当被视为不可能时, 就不再那么迫切了, 虽然那
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力求正确。² (米勒, 1995: 26)

其实该文强调的是理论经过翻译后所产生的衍异与创新, 质疑原本的权威, 指出“使之正确”之“不可能”及不具迫切性, 但为什么在付梓之前又突然冒出了“力求正确”之说? 就全文的论证而言, 增加的这几个字实在难脱蛇足之嫌。然而, 为什么在全文即将以原作者“无法阅读、知道或评价”的中文翻译流通时, 米勒突然要加上这几个字来自我削弱、解构先前的论证?

比较合理的——或者该说, 合情的——解释就是, 即使是著名的解构批评家, 即使在一篇讨论理论之翻译的理论性文章中(而且文章的论点在于肯定、甚或歌颂翻译在另一个语言与文化脉络中的衍生与歧异), 即使译者是交往密切且具有善意、专业训练及翻译经验的同行, 即使读者大多已历经后结构主义、解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 但身为原作者/被译者的米勒, 在面对自己的文章被翻译、前途未卜之际, 依然会多少担心、焦虑自己的(理论性) 文章在以另一种语言呈现时会遭到“误译”、误解、误读与误用, 所以有此“力求正确”的吁请与期盼。³ 这种吁请与期盼虽与该文的立论矛盾, 却属人之常情。

这则轶事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微妙关系, 也挑战了有关二者之间权力关系的传统说法。

2 最后一句原文为: “Getting it right” no longer has the same urgency when it is seen to be impossible, although that by no means means we should not try our utmost to do so. 引文中的下划线是笔者所加。

3 这多少印证了米勒在台期间于中山大学演讲前, 笔者在引言结尾时挪用他于《跨越边界》一文开头所引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台词: “Bless thee, Hillis, thou art translated!” (直译为: “上帝保佑你, 希理斯, 你被翻译了!”)。

二、“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译者，反逆者也”⁴

英文的“translate”来自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转移、迁移、搬动、传递”，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动，仿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而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国族的脉络中落地生根，成长繁衍。梵文的“*anuvad*”意指：“在……之后说或再说，借由解释而重复，以确证或实例来做解释性的重复或反复，以解释的方式来指涉已经说过的任何事”（“saying after or again, repeating by way of explanation, explanatory repetition or reiteration with corroboration or illustration, explanatory reference to anything already said.” [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9]）。此处着重的是时间的面向（尤其是“延迟”“后到”[belatedness]）和解释、重复之意。⁵ 中国自周朝起便有关于翻译的文献记载，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4 米勒（1995: 27）是这么谈论此意大利谚语是无法翻译的：“无法翻译的是很偶然而且本质上没有意义的事实：在意大利文中，把‘traduttore’一词中的‘u’变成‘i’、两个‘t’译成一个‘t’，便使得‘翻译’（translate）变成了‘中伤’‘叛逆’（traduce）”。这种论调与雅克布森在《翻译的语言面面观》（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以此谚语之无法如实英译来说明诗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如出一辙。米勒的原文中虽然没有试图翻译这句谚语，但一般的英译“Translators, traitors”可谓已经力求形、音、义兼顾了。此处中译为“翻译者，反逆者也”，也试图尽量贴近原文的意义、对仗及双声叠韵。若译为“译者，逆者也”，则更为简化，而且保持了意义、押韵及对仗，但未能顾及双声或所谓的“头韵”（alliteration）。

5 巧合的是，此处的说法正符合英文中“after”的第二种意义：“在……之后”和“依照……方式”。因此，“to say after”便意味着此行动在时间上是“后来的”“延迟的”，在方式上则是“学舌”“依样画葫芦”。

北方曰译。”(戴圣, 1965: 11) 因此, “译”原指专事北方之通译。许慎(1965: 22)《说文解字》把“译”扩大解释为“传译四夷之言者”。类似的说法除了明指“语言的传达”之外, 更暗示了我们/他们, 中心/边缘(中土与四方), 文明/野蛮(华夏与蛮夷)之辨。由“*translatus*”“*anuvad*”与“译”的含义, 可以看出其中涉及空间性、时间性、分野、阶序与高下。那么居中的译者之地位与角色又如何呢?

以往对译者的看法偏向于消极、负面、被动。一般的说法是, 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 服侍着两位个性迥异、要求不同的主人(serving two masters), 因此往往陷入左支右绌、动辄得咎的窘境。而译者经常被称为在从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a thankless job): 优点与荣耀尽归于作者, 缺失与遗憾则全属于译者; 译文的措辞与句法若太像原文, 虽有可能被赞为忠实, 但更可能被说成生硬不通、食“外”不化的直译、硬译甚至死译; 反之, 译文若太像标的语言(target language)般流畅通顺, 则又可能被质疑为了迁就本国语言而牺牲了原文的特色以及失去了可能丰富标的语言的机会。⁶ 总之, 翻译若“过”, 则犯了“添加之罪”(sin of commission), 若“不及”则犯了“省略之罪”(sin of omission)。更糟的是, “过”与“不及”的定义和标准不但人言言殊, 而且可从原文(译出语)与译文(译入语)的双重角度来检视。因此, 译者就成了语言夹缝间动辄得咎的中间人, 沦为“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的对象, 而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 反逆者也”或“译者, 逆者也”)这种怀疑、敌视、贬斥的说法, 也就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若是译文平顺或表现平平, 乏善或乏“恶”可陈, 则又仿如透明的载具, 读者透过译文直取文意, 以致“得意忘言(译文)”的同时, 也忘了译者的存在。换言之, 译者的宿命似乎不是被斥为“过”或“不及”(有时“两罪并发”)的违逆者, 就是沦为无人闻问、视而不见的透明人——而后

6 这就是翻译中亘古存在的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naturalization)之争。

者正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所痛斥的。⁷

然而，译者的地位果真如此不堪？在巴别塔之后，语言遭到错乱、无法直接沟通的世人，势必要仰赖译者；而“拈花微笑”“不立文字”“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说法，就是因为稀罕，才会广为传诵，引为美谈。如果说巴别塔之后，翻译是“必要之恶”，那么即使是恶，仍属必要。⁸ 因此，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根据自身翻译的实务经验指出，若只是一味质疑、批判翻译，要等待完美的译者出现才从事翻译，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⁹ 更何况对巴别塔之后的世人而言，除非不与异语者来往，否则早已置身于翻译之中了，而后来者更“总是已经被翻译了” (always already translated)。¹⁰ 因此，与其依循旧绪，以消极、负

7 韦努蒂于 1998 年出版的《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之副标题为“朝向一种差异的伦理”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承续前书《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之旨义，强调翻译中的异质性及异域性，因此如果后书中提及的现象是他所谓的“丑闻”的话，那么先前以专书处理的“译者的隐而不现”显然更是丑闻。出身职业译者的他对于当代英美文化中强调译文的流畅 (fluency) 颇不以为然，而主张“这种虚幻的效应‘译文的流畅、透明’掩盖了翻译中的许多条件，始于译者关键性地介入外来的文本。翻译愈流畅，译者愈隐而不见，而作者或外来文本的意义也被认定愈显而易见” (Venuti, 1995: 1-2)。有关前书的评论，可参阅 Robinson, 1997: 97-112。

8 参阅 Derrida, 1985: 171。

9 斯皮瓦克说：“只是批判，延缓行动一直到产生乌托邦式的译者之后，是不切实际的。” (“To be only critical, to defer action until the production of the utopian translator, is impractical.” [Spivak, 1993: 182]) 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直截了当地指出：“因为翻译并不总是可能，而且从未完美，就否认翻译的有效性，这是荒谬的。” (“To dismiss the validity of translation because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and never perfect is absurd.” [Steiner, 1998: 264]) 翻译家庞提耶若 (Giovanni Pontiero) 则采取更积极、正面的态度予以响应：“如果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绝对之事，那么它就是一件值得努力的绝对之事。” (“If the perfect translation is an impossible absolute, it is an absolute worth striving for.” [Pontiero, 1997: 26]) 一般说来，似乎理论家比较倾向于强调不可译性，而译者虽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遭逢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但基本上采取“先译再说”“且译且走”，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10 例如现今有几人能以原文阅读佛经或圣经，美国各大学里有关中国文学的课程以及台湾各大学里的西洋文学概论或欧洲文学等课程都采用英文教科书，每日媒体上的外电新闻……这些实例，俯拾即是。

面、被动的方式来贬抑这件必要之事，不如改弦易辙，以积极、正面、主动的方式来观察此一现象，并从生产的 (productive) 与践行的 (performative) 角度来看待译者。换言之，“翻译”与“译者”在当今的时空脉络下亟须重新诠释与翻译，以争回 (reclaim) 应有的地位；而类似“翻译者，反逆者也”的说法或“中伤”，也需进一步加以“翻译”与“反逆”。

三、译者的翻转/翻身¹¹

相关的挑战与反逆可由两个角度来探讨。从欧美的思潮来观察，其中荦荦大者如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以著名的三个比喻——碎瓶、切线、来生——来讨论翻译，既颠覆了原文作为源头的权威，也质疑了译文与原文如影随形的关系，试图为译文缔造新生。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进一步发挥，消解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从、甚至主奴关系，而拈出“互补” (complementarity) 之说。¹² 至于德·曼 (Paul de Man) 的理念与实作之间的落差也值得观察。他以本雅明的理论及其英译为例，主张不可译性，但在证明其论点时，却以另一人的佳译和自己的英译来质疑先前英译之不妥，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显可见。¹³

另一方面是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切入。在理论方面如尼南贾纳 (Tejaswini Niranjana) 特重翻译之情境与脉络，以历史化的思维重新省视翻译，尤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将翻译视为反抗与转化的

11 此标题与对译者的重视类似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的《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唯论证方式不同。这也与晚近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有关。

12 详见本雅明与德里达之文。相关的中文讨论，可参阅丘汉平、庄坤良、廖朝阳及张历君等人。

13 详见德·曼之文，也可参阅本书《翻译·介入·颠覆：重估林纾的文学翻译》。

场域。巴巴 (Homi K. Bhabha) 有关文化翻译的说法以及拟态 (mimicry) 等观念, 也为被殖民者的抵抗、反扑、逆写提供了理论根据。而斯皮瓦克身兼理论家与翻译者的双重角色, 由早年从法文英译德里达的《书写学》(*Of Grammatology*) 并撰写长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到后来挟多年学术声望, 英译故乡孟加拉女作家戴薇 (Mahasweta Devi) 的《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 Three Stories by Mahasweta Devi*), 附上访谈、序言、译注、跋语, 将她推上国际文坛。她的翻译实践与具体、平实、可行的翻译观, 足堪借鉴。这两股思潮合流, 大大挑战了旧有的翻译观, 也为译者的翻转 / 翻身提供了契机。

如果我们从“翻译”开始反逆, 那么“Traduttore, traditore”在“翻译成如此丰富、如此不同于英文 (就此处而言, 意大利文)、如此具有光辉的文学传统和知识传统的中文”之后 (米勒, 1991: 8), 衍异 / 演义出繁复纷杂的意义, 也就不足为奇了。就“翻译者, 反逆者也”或“译者, 逆者也”这个中文翻译而言, 至少具有三重意义: 违逆、追溯、预测。其中, “违逆”“不肖” (后者取其“不像”与“恶劣”二意), 最贴近意大利文原意和当今的中文用法。“追溯”则取“以意逆志”之意,¹⁴ 虽然难免“意图谬误” (intentional fallacy) 之讥, 却也是人类理解 (human understanding) 以及读书—知人—论世的重要方式。“预测”则取“逆睹”“逆料”之意, 把目标投射于未来——虽然这种预测可能违逆 / 违反原来的意思, 以致有“不肖”之讥。如此说来, 译者有意无意之间集三重意义于一身, 综合了逆与顺、反与正、不肖与肖似、前瞻与回顾、开创与溯源。这种说法似乎在米勒强调理论经过翻译之后在异地的新开始之外,¹⁵ 还同时包含了时空两个面向的越界: 既溯源也创新, 既回顾也前瞻, “既读取也传送” (“to retrieve and relay”,

14 《孟子·万章上》说: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意指诠释者务求超越文字、词句的限制与障碍, 从自己的意念出发, 去推想、揣度、追溯作者的意图。

15 由米勒《跨越边界: 理论之翻译》一文的标题可以看出, 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空间的, 虽然他对旧约路德 (Ruth) 故事的诠释也引进了时间的面向。

Hatim & Mason, 1997: viii)。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正是译者。原先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好的“译者 / 逆者”，在“翻译”之后竟能如此的翻转与翻身，真可谓“不可逆睹”。果真如此，又该如何看待译者的角色呢？

从本文开头所叙述的米勒轶事可以看出，其实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绝非作者宰制译者的单向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地翻转了。正如笔者在《理论之旅行 / 翻译》一文中所言，“原先为权力 / 权威来源的原作者，在另一个语言、文化脉络中，成为必须仰赖他人（即译者）的能力、善意、用功的被译者”。笔者并指出，“在晚近的翻译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为译者的身份、地位呼吁，强调他们身为再现者 / 中介者 / 沟通者 / 传达者 / 评论者甚至颠覆者的角色”（本书第 195 页）。此处拟进一步分述译者的不同角色。

四、译者的角色

简言之，翻译就是语言的再现，而翻译者就是语言的再现者 (representer)。萨义德 (Edward W. Said) 借用福柯 (Michel Foucault) 有关知识、论述、权力的观点，一再阐释再现的意义并落实于古今例证的探讨。¹⁶ 有意义的是，在标举“代表 / 再现”为书名的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中，萨义德 (Said, 1994: xv, 11, 12, 14, 113) 特别明指知识分子在代表 / 再现他人时，其实也代表 / 再现了自己。¹⁷ 我们据此引申：作为再现者的译者（也是某种意义的知识分子——至少是具备两种语言知识的

16 萨义德念兹在兹于再现的议题，也致力以理论和实际的方式挑战西方对东方——尤其伊斯兰世界——的再现。有关他对再现的关切与重视，详见《代表 / 再现知识分子：萨义德之个案研究》（单德兴，2003: 25—27）。

17 此书名之难译可见一斑，因此笔者在该书中译本《绪论》中特别指出，“中译难以兼顾这些含义，只得勉强译为《知识分子论》，取其中译可能衍生的另一些意思：‘知识分子本身的论述’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就本书而言，更是‘知识分子讨论知识分子的论述’，而在此代表 / 再现中，其实更代表 / 再现了萨依德”（萨义德，2002: 11）。

人)，在代表 / 再现原作（者）时，其实也代表 / 再现了自己。

我们或可据此将译者的角色姑且区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这里所谓的显性是指代表 / 再现原作（者）的译者，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作为以另一语言来呈现原作（者）的工作者之身份出现，而译作便是兼具作者和译者名号的文本。反之，所谓的隐性则指透过译本所代表 / 再现的译者，也就是以往不受重视、隐而未现的译者——有时甚至连真实姓名、身份都不为人知。在观察与省思译者的隐性角色时，读者多少得花一些阅读、考证、发掘的工夫，才较能察觉译者所采取的翻译 / 再现策略和手法。这些翻译 / 再现策略和手法中，较突出的是外加于原文文本之上的文字，如译序、译注、前言、后记甚至访谈、参考资料等。这些既是译者对文本与读者的（额外）服务，也代表了译者对文本与作者的认真负责，以期在正文之外更进一步再现作者。¹⁸ 至于隐入正文文本的部分，如措辞、句法等，则需要具有双语和批判能力的读者 / 批评者耐心对照原文或比对其他译本，以发掘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与抉择，其中大至通篇文体的选择，小到一字一词的译法，都是可以仔细探讨的对象。

-
- 18 正如斯皮瓦克所言，“我呈现自己对她（戴薇）作品的服务——翻译、序言、跋语（其实尚应包括访谈和译注）——希望你能鉴识出那个拥抱中发人深省的力量。”（“I present my services to her work—translation, preface, afterword—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judge the instructive strength of that embrace.” Spivak, “Afterword” to *Imaginary Maps*, 205）黄国彬穷 20 余年之功，于 2003 年出版的三大册《神曲》中译本，除了力求掌握原著的三韵体（terza rima）之外，也包括了绪论与译注，并在其他场合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又如笔者在翻译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时，除了再三修订译文之外，还添加了绪论、译注、访谈、书目提要、作者年表、中英及英中索引，以便读者定位原作者及作品。至于近年来台湾“国科会”主导的经典译注计划，也是希望借由学者 / 译者的加入，结合学术与翻译，并且要求必须有学术性的绪论、译注及参考文献等。如笔者耗时 6 年完成的《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就是此经典译注计划成果之一，除了正文中译十五万五千余字之外，另有绪论七万四千余字，译注九万四千余字，附录作者年表与大事记、人物与地名表、参考书目等，并补充 1726 年及 1735 年两版本之异 / 逸文。